

Academic Monographs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第二辑)

基于心理实验的 英汉摘译研究

王建华/著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based
Research on English-Chinese
Summarized Transla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第二辑）

基于心理实验的英汉摘译研究

王建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于心理实验的英汉摘译研究/王建华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第二辑)

ISBN 978-7-300-10880-3

I. 基…

II. 王…

III. 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3665 号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第二辑)

基于心理实验的英汉摘译研究

王建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格 北京中献拓方数字印刷中心

规 格 140 mm×202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6.5 插页 1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3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口译模式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4
第一节 国内外口译模式研究	4
第二节 口译研究的问题	12
第二章 变译理论	17
第一节 变译理论阐释	19
第二节 变译与全译比较	21
第三章 变译方法的运用	23
第一节 编译	27
第二节 摘译	38
第四章 摘要式翻译效果的心理实验研究	53
第一节 口译系统通道理论及相关技术研究	53
第二节 短时间大信息记忆人机交互研究范式	83
第三节 实验研究部分	97
第四节 综合讨论	133
第五章 结论	146
结束语	150
参考文献	152
附录 1	164
附录 2	169

绪 论

阿弗雷德·波拉德在论述《圣经》翻译的重要意义时说过一段不乏诗意而又极为深刻的话：“翻译如同打开窗户，让阳光照射进来；翻译如同砸碎硬壳，让我们享用果仁；翻译如同拉开帷幕，让我们能窥见最神圣的殿堂；翻译如同揭开井盖，让我们能汲取甘泉。”（廖七一，2001，1）波拉德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圣经》翻译而论的，但从中我们不难领会到，翻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既有精神之光芒，又有物质之果实。借助翻译，人类社会不断交流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无，彼此促进。应该说，没有旨在沟通人类心灵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即我们所说的翻译活动，人类社会便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可以说，翻译架起了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桥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国际交流中来，亲身感受到掌握一门外语的必要。英语之所以成为大多数人首选的外语，是因为目前全世界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以英语为母语或第二语言，还有更多的国家是把英语作为外语来使用的。据统计，到20世纪晚期，以英语为母语的有3.5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有7亿多；把英语作为外语来使用的有10亿之多，占世界人口的10%，其中就包括我们中国人。国外学者曾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一般成年人中调查他们全部的语言活动，发现其中“听”占45%，“说”占30%，“读”占16%，“写”只占9%（吴冰，2004）。可见，英语运用者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听和

上说，口译是对听和说的集中运用。

当前，国内外口译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口译模式的比较研究更为少见。口译包括听译和视译，在这两种不同通道输入的口译模式中，又可分为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根据翻译内容传递的情况，可以把口译分为直译、意译、摘译和编译等。从口译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口译研究的复杂性；同时，口译和笔译都是实践性比较强的社会活动，所以我们在研究口译的过程中就需要进行个案研究，从而确定翻译的效度和质量。

翻译的内容和体裁各式各样，从天文学到物理学，从语言学到新闻学，翻译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对翻译的研究只有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才可以得到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翻译的跨学科本质决定了更多的相关学科理论会被引入翻译研究，翻译的研究把语言学知识引入，从而在翻译研究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阶段，奈达的翻译科学研究就是语言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结果。翻译的文化研究，翻译社会学研究和翻译的跨学科研究都为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当前，翻译心理研究在慢慢受到关注，翻译活动的执行者是人，而不是文本。那么只要是人就必然涉及心理因素，换句话说，心理研究是翻译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其实，现在翻译界早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只不过没有冠之以心理学之名。比如德国所谓的目的学派，就是典型的译者主观的心理意识决定翻译策略的选取。再者，接受美学学派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读者接受文本的心理条件。国内外有学者对翻译的心理学进行了尝试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是把认知心理学的机制和模式引入到翻译研究中来，只是对翻译的过程进行了认知框架设计，从信息的输入到认知的加工处理再到最终的信息输出进行了分析。当然，必须看到现有的这些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虽然涉及心理因素，但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因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是实验的设计和心灵的测量。心理学研究是建立在心理实验基础之上的实证科学，而不是从概念走向概念的形而上学。

在这本书中，笔者通过一系列实验来测量摘要式翻译的心理机制，从视译阅读信息的完整状态和分割状态来测量译者的翻译速度

和翻译的信息传递量，从而考察信息呈现的连贯性对视译效果的影响；在第二个实验中，笔者通过字体不同的信息呈现方式测量信息呈现的清晰度对视译的效果，在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实验中，笔者通过对经济类、政治类和故事类以及英语类文章不同题材的新闻文章进行不同摘要模式的心理实验比较，从而考察何种摘要模式是最佳的视译摘要，为摘要式口译确定心理依据。本书正是立足于心理实证研究，通过实验数据，来揭示摘译这一翻译策略所涉及的心理因素。

第一章 口译模式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第一节 国内外口译模式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中,口译模式的研究开始涌现。口译模式分类多样,在霍尔姆斯(Holmes)的《翻译的名与实》中根据口译方式不同分为人工口译和机器口译(Snell-Hornby, 2006: 43),在传统的口译表达方式中分为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在口译训练模式中分为听译和视译,在口译研究模式中,口译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同时,口译还可分为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以及功能导向的模式研究(Munday, 2004: 10)。在国内,口译模式研究学者不多,但成果颇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仲伟合教授的口译模式内容方法研究硕果累累,蔡小红在口译的实证评估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扬州大学的刘绍龙从心理翻译学入手研究了口译的心理模式。

1. 国外口译模式研究的代表人物

国外口译模式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以塞莱斯科维奇与勒代雷为代表的法国巴黎释意学派创立了“释意模式”。法国巴黎高级翻译学院吉尔(Gile)教授的口译模式提出了“认知复合模式”(Effort Model)。瑞士口译研究专家让·艾赫贝尔提出了口译的语言观。瑞

士另一位口译研究专家莫热-梅尔赛重点强调了口译研究中从语言运用角度的实证研究 (Moser-Mercer, 1994)。

1.1 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

西方口译理论传入中国,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首先进入中国译界、同时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口译理论应该是法国的释意派口译理论。1976 年,曾获得“法国艺术骑士”称号的中国学者孙慧双翻译了释意学派领军人物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的代表作《口译技巧》(孙慧双,1976)。1990 年,汪家荣、李胥森、史美珍联合翻译了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和玛利亚娜·勒代雷(尔)所著的《口译理论与实践与教学》,书中将释意方法译为“释义法”或“释义学”(汪家荣等,1990)。两年以后,这本书的第二个译本《口笔译概论》诞生,由孙慧双翻译。释意派在书中被译为“达意派”,众多的核心概念译法也不尽相同。正式使用“释意派”这个词的学者是刘和平。在刘和平所翻译的《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刘和平,2000)、所撰写的“翻译的释意派理论”(许钧、袁筱一,2001)和“释意学派理论对翻译学的主要贡献——献给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教授”(刘和平,2001)等系列作品中,刘和平系统地介绍了释意理论的基本内核和理论术语、翻译程序与翻译评价标准,以及释意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并对释意学派理论的诞生、特点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述评,为释意派口译理论在中国译界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释意派理论的核心是把语言意义 (linguistic meaning) 和非语言的意思 (non-verbal sense) 区分开来。译者所要传达的不是语言符号的意义,而是讲话人在其话语中所表达的非语言的意思。也就是说,意义的本质是交际者通过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意思”,而不是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口译被释意学派视作最为理想的交际情景,因为在使用口译的场合,所有对话人都在场,他们共同具有同一个时空环境,在一般情况下,也共同具有与交际话题相关的知识。基于上述认识,翻译的目的应为传递意思,亦即交际意义;译者所译的东西应为篇章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是言语 (亦即语言的使用),而不是语言本身。口译并非基于对原讲话人语言的记忆,而是基于译者

对原讲话人所传递的交际意义的把握以及随后用目标语言对该交际意义（即讲话人的意思）进行的重组。

1.2 吉尔 (D. Gile)

在介绍口译（交替传译）的基本步骤和工作原理前，我们首先看一个由著名的口译研究学者、法国高等翻译学院教授吉尔（Gile）提出的口译模式，称为“认知复合模式”（Effort Model）。

吉尔认为，交替传译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Phase I : $CI = L + N + M + C$

Phase II : $CI = \text{Rem} + \text{Read} + P$ 即：

第一阶段：交传 = 听力理解（Listening）+ 笔记（Note-taking）+ 短期记忆（Memory）+ 协调（Coordination）

第二阶段：交传 = 对原文的记忆（Remember）+ 读笔记（Read）+ 翻译（Production）

上述两个阶段其实可以简化成“听”和“翻”两个步骤。第一步，译员“听”发言人的演讲。在这个过程中，译员要一边理解发言人的意思，一边记笔记，一边用大脑记下发言人的大意及逻辑关系。第二步，译员“翻”发言人的演讲。在这个过程中，译员要一边从大脑中提取第一阶段中记下的信息，一边看笔记，一边翻译。这种模式被称为多任务处理模式，该模式是建立在认知概念之上的，即人脑处理信息的容量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多任务处理过程中，对一个任务的处理不可能花费太多的时间，这就需要高度熟练的处理能力。如果在上述某个阶段不够熟练，对某个环节投入的精力过多势必会影响其他任务的处理，结果必然导致口译质量的下降，或译不出来。因此，要加强口译教学，必须在基础阶段首先结合口译特点加强和改革本科生的听、说教学，打下扎实的语言技能基础。

在交传基本步骤里，关键是如何协调各种行为（听、译、记）之间的平衡。吉尔提出，每个译员的能力（processing capacity）都是有限的，而在口译过程中，又要求这种有限的能力必须恰当的分配给听、译、记几种行为。吉尔教授指出科研的核心目的有：在原有的事实上增加新内容、对事实的新理解、检测现有事实认知的准确

性并改善之、检测现有事实解释的准确性。其他目的包括改变调查研究的方法、说服他人等。而科学研究的功能与目的也是紧密相联，也就是揭露不为人熟知的事实真相、通过分析数据来检查与提高现存事实认知度等。吉尔教授近年来对口译模式研究谈的较多是研究的方法，他谈到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区别，实证研究是为了认清事实进行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过程，它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用一幅展示了不同时期内口译变化的图形幽默地展示了这一特点。理论研究是从数据中获得理论。对于初涉研究领域者他认为实证研究相对容易，要想理论创新是很困难的，因为他要重新思考那经验丰富的学者们思考已久的问题。

1.3 让·艾赫贝尔和莫热-梅尔赛

20世纪80年代对瑞士口译研究成果的译介增多。瑞士口译研究专家让·艾赫贝尔1952年出版的 *Manuel de L'interprète* 一书，严格地说算不上翻译理论。但作为前理论时期的成果，它是经验性研究的代表作，为早期的中国口译研究提供了食粮。1982年由孙慧双翻译了艾赫贝尔的《口译须知》（孙慧双，1982，1992），在国内翻译界的口译研究中起到铺垫作用。1984年，这本书的另一译本《高级口译手册》由张晨君翻译，北京出版社出版。两个译本在外语界都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成为当时口译界进行口译教学的法宝。此书从翻译的语言观对口译提出规范和要求，这些规范和要求既有口译过程导向的规约也有口译结果导向的规约。口译过程和口译质量的评估在另一位瑞士口译专家莫热-梅尔赛的研究中得到了足够的重视，这位先驱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口译研究的模式，即社会科学中的实验研究用得最多的模式统计假设检验。研究过程是从受试者中取样，受试者要完成一项任务，或者受试者被置于一定的“控制环境中”，然后用统计测试方法检验假设，（统计方法包括“卡方检验”、“t检验”、“F检验”、变量分析等等），测试结果显示被测量和计算的值的“显著”和“无显著”。于是，假设要么被拒绝，要么被接受。口译中的实验性研究大多数都是这种类型（Moser-Mercer, 1994）。

2. 国内口译模式研究现状

2.1 以介绍国外口译理论模式为主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翻译》、《现代外语》等核心期刊先后介绍了其他影响较大的基于认知科学的口译理论。如,1998年,范守义撰文介绍了吉尔(即“嘉尔”)的《口译与笔译译员培训的基本概念和模式》。主要内容包括有关翻译教学主要环节的几个模式和有关的论述。即口、笔译交际模式、信息类句子的信息结构模式、口译三阶段模式、语汇引力结构模式、技术演讲的理解和翻译的顺序模式,等等(范守义,1998)。2001年,肖晓燕也介绍了吉尔的同声传译的多任务处理模式。她指出,吉尔的这一模式建立在认知科学概念上,其目的不是要描述口译过程,而是解释口译中出现的困难及译员常用的对策。吉尔的模式被认为是对以塞莱斯科维奇为代表的传统口译理论的挑战,给口译教学带来了新的启示(肖晓燕,2001)。同年,吴义诚对国际上第一部以翻译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口/笔译的认知过程》进行了评介,着重介绍了书中所载四大议题的研究内容:翻译过程的研究路向与方法、翻译认知过程的描写和解释、翻译习得与翻译能力的发展以及口译的认知心理过程研究。吴义诚认为该书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它对翻译学、语言学及心理学研究都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2.2 国内口译模式研究的代表

除介绍国外口译理论和口译研究之外,国内学者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出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仲伟合教授的口译模式、内容、方法研究把口译的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和功能导向(functional-oriented)可操作化,此研究把德国Skopos翻译流派代表人物赖斯(Reiss)所提出的翻译三类型中的可操作(operative)类型(Snell-Horby, 2006, 82)与翻译科学研究的鼻祖霍尔姆斯(Holmes)所提出的翻译科学规划图中的应用性(applied)实现了结合(Munday, 2004, 10)。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蔡小红在口译的评估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口译评估符合翻译界提出的当前翻译结果导向(product-oriented)以及翻译评论中的口译效果评估(translation-review)。口译效果评估研究包括对口译过程的评估和口

译结果的评估,另外还有口译教学模式绩效的评估等。在蔡小红的研究中,实证研究一直是主要的研究模式。扬州大学的刘绍龙从翻译心理学的机制入手研究了口译信息加工与处理的过程。总之,国内外口译研究越来越侧重于把口译模式混合化。

2.2.1 口译模式内容方法改革研究

仲伟合教授在口译模式设计时,重点强调了口译的方法、目的模式特点及内容。仲教授对口译的整个过程和流程做出了详细的分类和描述,他的翻译研究是以教学过程为基本的设计蓝本,对口译培训的各个环节作了详细的划分,同时对每个环节要达到的目的及培训结果给出了预期。在翻译理论中,Skopos理论一直是近几年翻译界推崇的理论,在口译界,虽然研究人员和相关学者很重视释意派理论和吉尔模式研究,但是口译是以听者为对象,以听者的满意度为评估标准,所以口译的结果很重要,翻译的目的论对整个口译模式的设计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仲教授的口译模式设计以目的论为指导进行设计,在他的口译《翻译研究:理论·技巧·教学》一书中提出了口译的各项策略,包括口译中的省略、增添的策略以及教学训练的模式,这些模式中包括直译、意译、变译和摘译等手段(仲伟合,2000)。这些口译技巧和策略的提出对口译效果的评估也有了一定的先验作用,唯一不足的是仲教授没有给出口译实证的研究量化指标和结果。但是,仲教授对口译模式的探索性研究,在中国可以说开了先河,并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2.2.2 口译的评估研究

蔡小红对口译教学的模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针对国内在口译训练方面缺乏训练绩效研究的现状,蔡教授摸索出一套“授之以渔”的口译互动式训练模式。此模式提出了以技能训练为导向,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知识和交际能力为目标的训练模式。此模式注重学生的主体性特点,此模式是动态的,在训练过程中不断提高和完善,能优化师生配合,从而达到模式的先进化(蔡小红,2008)。蔡小红教授对口译的重大贡献在于对口译实践和口译培训的质量界定和评估方面,在蔡教授的专著中,质量评定在口译中的作用得到了深刻的探讨,此探讨过程中蔡教授对实证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无论从口译的评定标准还是从口译的过程以及口译的教学和模式都进行了目的、模式和特点的评估研究。从这一点来看,口译的目的论(product-oriented)很重要,口译的模式和过程都必须围绕着目的而展开,同时受口译目的的制约。所以,德国的 Skopos 理论在口译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蔡教授的研究可以看出,Skopos 理论在无形中得到应用。蔡教授的研究重视实证,这在中国的口译研究中独树一帜。就方法论而言,蔡教授的研究是把国外的理论中国化了。霍尔姆斯(Holmes)的翻译理论的研究规划和翻译理论研究路线图在中国通过蔡教授得到发扬。

2.2.3 口译心理学研究

刘绍龙先生把心理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引进到口译的研究中来,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具有创造性。按照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处理模式,口译过程是最适合此模式的。认知心理学认为信息的加工和处理要经过信息的输入、信息的加工和信息的输出三部分。而信息的输入是多通道的,我们的眼睛、耳朵和触觉都属于信息的输入系统,而我们的嘴巴、肢体语言都属于信息的输出系统。在输入和输出的中间是信息的加工过程,包括理解、记忆、语音感知、词汇识别、句法分析和意义分析等过程,意义分析中包括解歧、分类组合、信息监控和概念表征,词汇识别过程中包括分解和合成,句法加工中包括句法分析和句法合成等。刘先生对信息的记忆存储系统作了详细的规划和布局,他认为记忆过程包括若干子系统,有信息的选择、加工、存取和重构等心理过程,这个过程称为“操作”机制(刘绍龙,2008)。刘先生的研究提出了口译心理的加工模型,遗憾的是刘先生没有能够通过心理实验的方式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口译模式如果能够用实证的方式加以验证,此模式就是真正的揭示口译心理机制的模式。

2.2.4 技能训练模式

林郁如和陈菁两位老师提出的“以技能为中心的口译训练模式——兼论‘厦大模式’”在多次国内大会上进行阐述,并在训练中得到诸多尝试。对比吉尔模式与厦门大学模式,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即两者都强调语言知识与言外知识及其对两者

的分析是口译理解的重要内容；两个模式都强调理解是口译的第一步。吉尔的模式来自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模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具体、直观，对于从事口译实践的人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对口译过程阐述的较为清晰、明了，对口译技巧提的较为具体（如：口译笔记、短期记忆等）。而厦门大学模式则较为宏观，厦门大学模式以技巧与职业准则为训练核心，强调口译过程中对语言及言外知识的理解、语篇与跨文化交际因素的分析及语言信息知识的重组。强调技巧的重要性，给口译培训者提出了重要的启示，即口译训练应以技巧（技能）训练为主。上述两种模式对口译工作人员及口译训练者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口译训练的内容、方法及口译课的课程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口译的厦大训练模式缺乏实证研究，这也是不足。

2.2.5 口译动态研究模式

北京语言大学的刘和平博士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兼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目前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同时从事口笔译工作。译作有《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街心花园》、《世界六十位作家和他们的母亲》等，著作有《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并发表翻译研究论文多篇。

在她的研究和发表的文章与专著中，她一贯倡导口译教学要大纲化，口译教学的内容要立体化，口译研究要动态化，口译手段要具有针对和强烈的指导性。她的研究往往采用梳理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对口译理论和教学研究进行宏观评述与分析，分析阐述口译的特点和要求，探讨口译研究在翻译学中的地位。她在多本著作中介绍评述新世纪中外口译研究的趋势和特点，讨论口译职业特点和变化，进一步探讨口译理论与口译教学法的关系，分析不同类型口译训练的异同，力图提出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教学方法。

在口译教学方面，她以她的新作《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为蓝本，说明了她对口译教学的独特理解。刘和平认为，目前的中国翻译研究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即对翻译结果的研究上，

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即忽略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揭开翻译过程之谜,把它教给学生,必须对翻译的动态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为此,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十分重要。刘和平还以三组学生生动的口译演示为例,说明了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学生理解和接受意义的思维过程,而非词与词、句与句的简单对等。她的这种“渔生鱼”的教学理念引起了口译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刘教授对口译的训练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并进行了口译教学的革新。她的口译训练设想如果能够进一步通过数据的形式具有说服力地表明其有效性,则不失为一种有效且可以借鉴的方法。

第二节 口译研究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口译研究、翻译教学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虽然近年来有了一些专著,但大量的仍然是以实用性、经验性为主,从上升为理论意义上来看,特别是和文学翻译研究等相比,还是比较弱的。而国外仅用英语出版的翻译研究专著中,这三类书籍都不少。荷兰的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出版的一套翻译研究丛书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从1994年开始,之后的8年间已经出了第42种,其中口译方面的专著就有12种,兼谈口笔译的3种,这些书都不是那种技巧堆积式的教材,而是有明确的方法论特征的研究性教材或专著。此外,翻译教学研究方面的有8种,机器翻译研究的3种。这还只是一家出版社、一套丛书的情况。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语言和语言学系有一个计算机辅助语言学研究中心,出版的机器翻译方面的书籍更多。近年来,中国的翻译期刊除了介绍国外的口译之外,介绍国内口译成果的不很多。写口译的文章实在太少,研究口译的学者实在太少。笔者查过《中国翻译》近3年的期刊,1998年只有2篇,1999年有4篇,10年过去了,2008年《中国翻译》第3和第4期上只有1篇关于口译的文章,可见口译的研究仍然较少。对于口译的研究远远滞后于笔译,也远远不能满足口译实践水平提高的需要,笔者与读者的交流中发现,对于口译的基础研究

即口译的技能习得颇受广大的一线口译工作者及初涉口译领域的大学生、研究生的欢迎。笔者还发现口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少，口译模式研究更需要实证研究来进行有效的评估。

总之，口译的研究远远滞后于笔译，也不能满足口译实践水平提高的需要。口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少，口译模式研究更需要实证研究来进行有效的评估。口译和笔译都是实践性比较强的社会活动，所以我们在研究口译过程中就需要进行实证研究，从而确定翻译的效度和质量。

当前，翻译心理研究在逐渐受到关注。其实，在翻译界早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只不过没有冠之以心理学之名。比如德国所谓的目的学派，就是认为译者主观的心理意识决定翻译策略的选取。近年来，国内已经有学者对翻译的心理学进行了尝试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是把认知心理学的机制和模式引入到翻译研究中来，只是对翻译的过程进行了认知框架设计，从信息的输入到认知的加工处理再到最终的信息输出进行了分析。但是，必须看到现有的这些研究虽然涉及心理因素，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因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是实验的设计和心灵的测量。国内外的翻译研究很少有心理机制的实证研究，口译研究中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则更为罕见。

1. 口译过程导向研究中的问题

口译的操作过程是首先理解原文，经过分析，然后重新组织，最后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英汉口译要求具有较高的英语和汉语水平、宽广的知识面和高度的责任感，口译的翻译过程中还涉及听力、记忆和口头表达；同时，口译是需要当场、即时完成的，译员通常听到的是只讲一次、不再重复的话语，他在正确理解的同时必须立即独立地进行一次性的翻译。一般情况下，译员不大可能、也不容易在现场求助于他人、查阅词典或其他资料；如果出错，即便有可能在事后纠正，仍然比较麻烦。因此，较高的英语和汉语水平、宽广的知识面和高度的责任感这三条对口译工作者更加重要，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口译课的教学重点和方法。由于口译译员的工作